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先秦两汉

已酉年

译注 高振铎 刘乾先

审阅 黄葵

国语选译



Z121.7
77831 16:L3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

国语选译

史名著选译丛书



责任编辑：冯 杰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技术设计：盛寄萍
插 图：董 唯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国 语 选 译

高振铎 刘乾先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10.625 字数150千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1年1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15,000—65,000册

ISBN7-80523-375-8/Z·27

定 价：140.00 元(50种)

122/50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本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文力

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国语》是我国秦以前的一部历史典籍，记述了上起西周穆王伐犬戎（公元前967年），下到智伯灭亡（公元前453年）春秋时期及其前后的约500年间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部分史事。分为《周语》3卷、《鲁语》2卷、《齐语》1卷、《晋语》9卷、《郑语》1卷、《楚语》2卷、《吴语》1卷、《越语》2卷，共21卷，7万余字。各语次序的排列，体现了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亲疏关系，把鲁、齐、晋、郑排在前边，既说明这4个诸侯国和周亲密，又表明编者重视诸夏（中原诸侯国）；把楚、吴、越放在后面，除说明这3个诸侯国和周疏远，又表明编者轻视夷狄（边远少数民族诸侯国）的观念，这是春秋和战国初期的时代观点。

这种分国记事的体例，是中国史书中的首创，称为“国别史”，对后代很有影响，陈寿的《三国志》等便是由《国语》体例发展来的。《国语》所记八国史事并不是有系统的，而是有重点地记述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各语分量也轻重不同。最多的是《晋语》有9卷，齐、郑、吴三语，各仅1卷。所记主要内容基本和《左传》同是春秋时期史事，但因《左传》以记鲁国史事为主，叫作《春秋内传》，《国语》却分八国记事，便被叫作《春秋外传》。

因为《国语》和《左传》同记春秋时期史事，所以两书出现一定的重复。据统计在《国语》记事中和《左传》内容大致相同的有60多条。两书内容的差异占多数，其中差异最大的莫过于越灭吴的记载。其他如《齐语》记齐桓公用管仲改革内政和军事组织，以及春秋末期吴、越争霸过程，都有绘声绘色的描述，补充了《左传》对齐桓公称霸、吴越争霸记载的不足。

《国语》的作者，相传是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这是西汉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最早提出来的，东汉的史学家班固进一步肯定了《国语》为左丘明撰，可见汉代学者都认为左丘明是《国语》和《左传》的共同作者，但是此说并不可靠。唐朝以后兴

起了怀疑古代的风气，有些学者提出《国语》的作者并不是左丘明。清朝的考据学者赵翼认为：“《国语》本列国史书原文，左氏特简料而存之，非手撰也。”（《陔余丛考·国语非左丘明所撰》）即认为《国语》是春秋时期各国史书的原文，只是经过左氏选择整理过，并不是他撰写的，这种看法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承认。近现代的一些学者一般认为《国语》并非一地一时出于一人之手的作品。

《国语》的成书年代，一般认为当在战国初期。春秋之际特别是战国初期，正处在社会变化过程中，因而《国语》反映了人们在社会变化过程中的一些进步观点，是很可宝贵的文化遗产，对我们建设两个文明也有借鉴之处。这些内容主要有下列各点：

一是反对暴君统治

书中虽然对传统的“周礼”仍有一定的感情，但并不讳言反对暴君的统治。例如《周语上》的“邵公谏厉王弭谤”、“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前者是反对压制言论，后者是反对垄断山林川泽财富不让百姓开发。描述厉王既迫害“国人”又使百姓无生活出路，最后“国人”被迫起义，把厉王赶到彘地。体现了作者谴责暴君统治的观点，反映了

有压迫就有反抗的必然性。又如《鲁语上》“里克论君之过”中说晋国人杀了晋厉公，鲁成公听到后问群臣：“臣杀其君，谁之过也？”里克毫不掩饰地说：“君之过也。”意思是说晋厉公被杀是咎由自取，因为他犯的过错太多了。

二是反对贪婪奢侈

贪婪奢侈是剥削阶级的本性。作者反对贪婪奢侈，目的在于说明贪婪奢侈会导致统治者的败亡，用以警惕统治阶级，但能对此进行典型而深刻的揭露，则是很可贵的。例如《楚语下》“子常问蓄货聚马斗且论其必亡”中，斗且说令尹子常专心搜刮财富，如同饥饿的豺狼一般，必然灭亡。即便是一国之君奢侈无度也必然要亡国的。又如《楚语上》“伍举论台美而楚殆”、《楚语下》“夫差伐齐不听申胥之谏”中，两次提到楚灵王不顾百姓死活大修章华台，最后导致兵变，灵王自杀的事。吴王夫差一意修姑苏台，耗尽民力，成为被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对贪婪奢侈，必然要歌颂节俭。《周语中》“刘康公论鲁大夫俭与奢”中，刘康公出聘鲁国回来后回答周定王说鲁国的季、孟两家节俭，俸禄可以够生活开支，能够保障全族人的生活，不致失

败。《鲁语上》“季文子论妾马”中说季文子是鲁宣、成二公的相，但是他很节俭，家里“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仲孙它劝他说这样会使人说他吝啬，对国家也不光彩。可季文子却对他说：“人之父兄食粗衣恶，而我美妾与马”，就不配当相了。掌握全国大权的首揆还能想到穷困的百姓，实在不容易。特别感人的是前举《楚语下》“子常问蓄货聚马斗且论其必亡”中，斗且举子文三次当令尹，却穷得吃上顿缺下顿，楚成王得知特意为他每天上朝准备一把肉干和一筐干粮给他吃。成王每次多发给他俸禄时，他就立即逃走，直到不再给他的时候才回来。于是有人问他：“人生求富，而您却逃避，是什么缘故呢？”他认为当官是要保护百姓的，百姓还很穷困，我却富有起来，那是搜刮百姓，自己发财，便要死到临头了，因此他说：“我逃死，非逃富也。”

三是反对傲慢无礼言行

作者认为傲慢无礼的言行，必然会造成一个人的失败。最为突出的事例如《周语中》“单襄公论郤至佻天之功”，说晋国在鄢陵打败楚军后郤至到周王室向天子“告庆”（报喜）过程中，把晋军打败楚军的功劳完全归于他自己。单襄公说他是刀架

脖子上不知死活，认为是贪天功以为己力，郤至后来果然被杀。又如《周语中》“王孙满观秦师”，说秦军千里迢迢偷袭郑国，路过周天子北门时，仅赶车的兵士下了车，而且只摘掉头盔拜了一拜，便跳上了兵车。王孙满认为这种既轻佻而又骄傲的军队，缺少谋略和礼貌，没有礼貌必然松弛，缺少谋略就要陷入失败境地。果然，秦军伐郑不成退兵路过崤山时被晋军袭击，全军覆没。

四是重视人才

重视人才的事例在许多章中随处可见，其中有欢迎执政者重视人才的。例如《晋语九》“赵简子问贤于壮驰兹”，赵简子问壮驰兹吴、越一带谁最贤，壮驰兹立即对他拜贺，说一个国家将要兴旺起来的时候，当权者总是礼贤下士的，到要灭亡时，便要嫉贤妒能了。还有对因政治迫害造成人才外流提出批评，例如“蔡声子论楚材晋用”中，说楚国的一些人才因当权者是非不明，才含冤受屈逃奔他方，盼望澄清是非，早日回归故国。由于这种愿望无法实现，才帮助晋国打楚国，给楚国造成很多损失。因而强调只有政治清明，才能制止人才外流。至于《齐语》中说齐桓公所以能称霸，作者直接了当地说就是因为能任用管夷吾、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

牙这些人，才建立了霸业，完全归功于人才。

五是看到了群众的力量

在《国语》中尽管还存在着英雄史观，夸大个人的作用，但在一些篇章中却也出现了重视群众力量的记述。例如前举《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中，奴隶主贵族邵公看到了群众的力量，才提出不能压制人们讲话。他说防止百姓讲话，比堵截江河还危险，堵塞江河一旦决口，一定要淹死很多人，把百姓逼急了也是这样。还有《晋语五》“郤献子等推功于下”，在晋齐笄靡之战中，郤献子率军打败齐国，晋景公认为胜利是将佐们的功劳，但出乎意料，带兵的将佐却把胜利归功于兵士。这绝不是虚伪的谦逊之辞，而是他们在战争中看到兵士奋勇杀敌才得出的符合实际的结论。

《国语》和《左传》不仅是先秦的重要历史典籍，同时又是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散文集。从散文的发展上看，《国语》又有新的特点。

首先是以记言为主。

《国语》是以记载历史人物对话为主的一种史书，和《左传》以叙事（虽然也有对话）为主不同，它是通过人物的言论、对话和互相驳难反映历史事件或说明一种观点的，所以书名叫《国语》。综观全

书，它是记述历史得失成败的，一般是在列出事实之后得出一个结论。《越语下》范蠡帮助勾践吸取吴王夫差过去同意勾践讲和而遭失败的教训，提出一定不能重蹈夫差复辙，应坚决灭掉吴。这种从事件引出的历史教训，是和古人把历史主要用于“教诲”的目的有关。

其次是生动幽默，妙趣横生。

有些篇章中的情节和对话，写得极为生动幽默，妙趣横生，使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例如《晋语八》“叔向谏杀竖襄”中说晋平公射一只鹁雀不死，让竖襄去捉又没捉住，便要杀死竖襄。叔向得知后立即去劝平公一定要杀死竖襄，理由是晋国始祖唐叔，曾经一箭射死兕牛，用它的皮制了一幅大甲，凭这种才能得封为晋君。他对平公说，您作为唐叔的后代，连一只鹁雀都射不死，还捉不住，这是宣扬您的耻辱，因此您一定要快些杀死竖襄，以免传扬出去。这一段正话反说的妙语，极有风趣，把一箭射死大兕牛的唐叔受爵得封，同平公射不死小鹁雀反而要杀人，加以鲜明对比，显出平公既无能又残酷。这一个尖锐的批评，使平公感到惭愧，于是赦免了竖襄。类似这类篇章的还有《晋语九》“董叔欲为系援”、“阎没叔宽谏魏献子无受贿”等，这在先秦古籍中是少见的。

第三是善于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

作者通过特定的环境和矛盾斗争，用具体而又细致的对话，刻画人物的精神面貌。例如《晋语二》“骊姬谮杀太子申生”中所描绘的晋献公好色昏庸，听信谗言；骊姬阴险毒辣，陷害申生；以及申生愚忠愚孝，甘心等死；里克胆小怕事，保持中立，都刻画得维妙维肖，如在眼前。又如《吴语》中对申胥（即伍子胥）的描述，突出了他对吴、越两国誓不两立形势的分析，揭露句践阴谋报复吴国，反对夫差劳民伤财大修姑苏台，劝阻伐齐称霸以及最后被迫自杀等明智、忠贞、果敢、坚决的精神面貌，成功塑造了这个人们尊崇的高大形象。

总之，《国语》作为一部史书，不论在史学价值还是在文学成就上，对后代的影响都是很深远的。司马迁撰著《史记》，《国语》就是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人们从来都把《国语》和《左传》相提并论。韦昭在《国语解叙》上甚至说《国语》实际上可和儒家经典并驾齐驱，地位在诸子书之上。尽管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写过《非国语》，批评它的迷信色彩，但也充分肯定了：“其文深閎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但是到近现代确也有人从思想到文学成就上，对《国语》加以否定，例如崔适便认为“荒唐诬妄，自相矛盾者甚多”、“文词支蔓，

冗弱无骨。”（《洙泗考信余录》）这种过激之论，不够公允，但却对后人颇有影响，致使人们对《国语》的重视和研究远不如《左传》。特别是建国后所编写的古代汉语教材或古代散文选，一般都不选《国语》的文章，这是不合适的。《国语》是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典籍之一，应该对它认真学习和研究。

关于《国语》还有几点需要说明：一是文章风格不尽相同。如《周语》、《鲁语》从思想到语言，都和《左传》相似，但《吴语》、《越语》却和《左传》相差甚多。这除了能证明它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外，也有可能是经编者辑录之后没经过加工修饰。二是体例上的不同。例如《周语》、《晋语》、《越语》等有简略的年代记载，其他各语却没有纪年。三是繁简不同。例如《晋语》的详尽程度超过《左传》，而《郑语》记事分量最少，极为简略。当然这也可能是由于辑录人保持原样未经整理所致。四是指导思想的不同。前20卷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卷21的《越语下》则是用道家思想写成的，这在先秦典籍中还是少见的。这也可能如有人说的是后人所作，附在《国语》后面的。以上四点多少可以证明《国语》一书绝非一时一人之作，又没有作过加工修饰，保存了原来的一些面貌，倒是很可宝